

施复亮的著作

宋亚文



施复亮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又名施伏量、施光亮等，浙江金华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中央首任书记、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民主革命时期，施复亮除在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外，还出版译著、专著和编著等40余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 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奋力翻译外文著作、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6月，施复亮赴日本留学、养病，同时受党组织委托筹建旅日华人中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他刻苦攻读，很快便克服语言障碍，从1921年起就大量翻译日文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寄回国内发表。1922年初回国后，他边工作、边著述，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时期，他翻译的著作达24部之多，其中，独立翻译15部，其中包括：班纳柯克著《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蒲格达诺夫著《经济学大纲》、石滨知行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田茂树著《世界社会史》、福本和夫著《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进程》。

《社会经济丛刊》由施复亮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劳动问题》、《社会主义底进化》等译文集结而成；《马克思主义学概要》与《资本论大纲》两部是高晶素之的著作；《资本制度浅说》《辩证法与资本制度》和《转形期底经济理论》为山川均的著作。施复亮的译著中有两部关于财政学的著作，其中，《新财政学》原著者阿部贤一，《财政学大纲》原著者大内兵卫。此外，他还有《欧美无产政党研究》和《苏俄政治制度》两部关于政党和政治制度的译著。

《欧美无产政党研究》和《日本无产政党研究》两部译著为大家了解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重要参考。《苏俄政治制度》主要介绍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施复亮与他人合译的著作有9部，包括：与陈望道合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原著者蒲格达诺夫)；与钟复光合译的著作有《苏联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近代社

会思想史要》《工会运动底理论与实际》《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等5部；与周白桦合译的著作有《实用经济学》《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史》《经济史纲》等3部。

这些译著是施复亮20余年呕心沥血、奋力翻译的成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方面面，它们中的大多数出版后深受欢迎、数次重印、广为流传。

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施复亮在完成繁重工作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付出了巨大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的编著、专著达17部之多，内容涵盖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诸多方面。

施复亮从步入社会起就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曾说，社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包含着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社会运动以及其他一切由现社会的矛盾与缺陷中所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他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有7部，其中5部编著、2部专著。

1922年，施复亮编著的《劳动运动史》(署名施光亮)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其中1927年第4版后附有“勘误表”，对多处文字及表述错漏进行了修正，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作风。

1923年秋，施复亮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主要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他编写课程讲义，于是《社会运动史》《社会

思想史》《社会问题大要》三部编著先后问世。其中，《社会运动史》出版地及出版年代有待考证；《社会思想史》192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会问题大要》1929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另外，他还编撰了《社会科学小辞典》(署名施伏量)，1935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其中共收录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史地、诸科学及国际知识等重要名词、事件1320余条，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贡献良多。

施复亮关于社会问题的两部专著为《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署名施伏量)，1930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立法”“劳动运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社会科学的研究》(署名施存统)，1930年由上海宏远书店出版，主要阐述了“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社会革命”“国际知识”“社会科学家”等。

除此之外，施复亮还出版了关于政治、经济等问题的专著10余部。

1926年8月，他受党组织委派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主要承担《社会进化略史》《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及训练》两门课程的教学，因《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及训练》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便自己撰著《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及训练》一书，并于1926年底在广州出版，后来又被翻印、再版多次。他在该书自序中说：“这是我与中大同学叙首二月的一个纪念品。我希望由这本小册子的介绍，使我对于中大同学能有一个小小的贡献，在革命的进程中手携着手欢乐地前进。”

《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底理论问

题》三部著作，由施复亮发表在《革命评论》《新生命》等刊物上的文章分别集结而成。其中，《目前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1928年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1928年由上海新东方书店出版。另外，《复兴中国革命：附中国革命问题》(署名施存统)1929年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主要由他1928年在上海大陆大学的讲演稿集结而成。这4部著作性质相同，主要阐述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政治见解，也是他认真思索中国革命前途所发出的呐喊。

施复亮向来比较关注日本的动态，1929年初，他的专著《日本无产政党研究》(署名施伏量)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主要内容为他发表于刊物的《日本无产政党底过去和现在》《日本普选与无产政党》《劳动农民党底成立及其解散》三篇文章，同年4月再版时又增加了《从无产大众党到日本大众党》一文，他期待该著的出版在当时的反日高潮中，能够帮助国人加深对日本问题的理解，能够使国人对日本无产政党的现状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发表自己的抗日主张，并于1937年由上海进化书局出版专著《民主抗战论》，提出了“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全民抗战”“民主的抗战”等主张，形成了自己的抗战思想。

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施复亮也非常注重对中国经济前途的探索和思考。1932年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他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的专著，其中提出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性质是“殖民地化的复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经济的前途只能是实现社会主义等重要观点。

面对抗战后后期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不但呼吁国人要重视经济问题，还身体力行地致力于大众经济知识的普及。1942年9月至1943年1月间，他连续为《新民报》撰写92篇普及经济知识的短文，因深受读者的喜爱，这些文章又于1944年集结成《经济漫谈》一书，由重庆文萃出版社出版。他的好友寇如松在序言中赞叹说，该著把很懂懂的理论用经济事实很平易地叙述出来，读起来不像是研究经济问题，更像是在读一本故事书似的引人入胜。

另外，施复亮还著有《人生问题五讲：做人·做事·及男女问题》，1947年由上海新书店出版，该著由他1942年为四川省银行行员训练班编写的“服务哲学大纲”讲演稿删改增补而成，对广大青年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助益颇多。

以上著作是施复亮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结晶，也是他民主革命时期心路历程和人生经历的写照，它们涵盖了他对中国命运前途的关切、对国共合作的积极宣传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的理论探讨等诸多方面，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文人轶事

李大钊遇害后，有一块没有公开面世的墓碑深埋地地陪伴着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7年4月28日，在当时的京师看守所，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送上绞刑架，李大钊第一个英勇就义。

李大钊生前身系5所高校的教授，收入不菲，本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但他将工资等多用来作为革命经费，或者资助困难学生，或捐给公益事业，自己所留的并不多。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此情况，曾吩咐学校会计每月发薪时将李大钊的大部分工资直接送到他家中，交其夫人赵纫兰，以免被李大钊“挪作他用”。

李大钊被害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当时督军潼关的冯玉祥闻讯放声大哭，并召开追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志哀，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刘半农称赞李大钊“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曾在北京浙寺里存放了6年。直到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

文人轶事

1927年，陶行知为了推行“改革全国乡村教育”的主张，告别安逸的教授生活，来到南京北郊神策门外的一个荒凉山庄，创办了晓庄师范。陶行知刚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住宿的地方，就和同事们借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条件艰苦，他却很乐观。在写给妻子的信里说：“我们晚上睡在稻草上，暖 and 得很，比睡在弹簧钢丝床还舒服。我们六个人睡在一起，一位是钱向志先生，三位是安徽公学的校工，一位是我自己，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朋友，你们猜猜是谁？我想，你们猜上三天也不会猜出来，呵呵，猜不出来吧，还是我来告诉你们吧，它是一头耕地的水牛，睡在我们旁边，它勤劳勤恳，任劳任怨，且忠厚老实，也非常干净。”

同事们一觉醒来，看着边上的牛，总感觉有些不对劲。陶行知却对大家说：“在我们安徽，称绩溪人为绩溪牛，因为那里的人吃苦耐劳，我们应尊重牛，而且要学习牛拉犁不松套的精神，牛是农家的命根子，牛是我们人类最亲近的朋友。美好的生活是靠我们像牛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脚踏实地辛勤劳作换来的。”

晓庄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陶行知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此联读来不仅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他一贯倡导教育改革的宗旨，旗帜鲜明的倡导深入农村接触社会。陶行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穿上布衣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生产，挑粪种地，睡地铺，住牛栏，并与牛为友。他与牛为友，可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精神。他一生为发展中国的平民教育鞠躬尽瘁，扑心扑命，用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形容他的一生，再贴切不过了。

文人轶事

1932年，熊式一因无“海归”背景，无法获得大学教职，一气之下，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

熊式一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自1929年起，他就在《小说月报》《新月》等新文学杂志发表翻译英国大剧作家萧伯纳、巴雷等的作品，受到徐志摩的推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到英国最想见的3个人之中就有萧伯纳。

这个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他抵英不久，萧伯纳也结束访华归来，专门邀请熊式一到家中做客。这次会面给熊式一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萧伯纳已近80岁且是誉满全球的大戏剧家，而熊则是刚30出头的年轻学生。萧伯纳不但替他脱大衣、移椅子，而且请他先坐下，自己才就座，让熊式一感到惊奇佩服。

到英国后不久，熊式一开始尝试用英文创作，自然免不了向萧伯纳请教。最先请萧伯纳过目的是英文戏剧《财神》，萧伯纳一面称其“比英国人写的英文高多了”，一面又说“应该叫它做中国的英文”，令熊式一摸不着头脑。

后来，熊式一又创作了戏剧《王宝钏》，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在英国连演3年，在美国巡演也大受欢迎，剧本出版后十分畅销。对此剧批评最严的正是萧伯纳。戏未上演时，他不置一词，等到

霍宝树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农矿处处长、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计处处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董事、中国银行副总裁、淮南矿路公司董事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9年前往美国，1959年任台湾中华开发公司总经理。1963年12月在美国病逝。

刘航琛曾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粮食部次长、川盐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1949年去台湾。1975年9月卒于台北。

浦拯东曾任交通银行汉口、重庆分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主席，四行联合办事处总贴放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财政局一局局长，上海市银行董事长、中汇银行总经理，兼任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太平洋保险公司、润华企业等多家银行、公司的董事、常务董事、总经理、协理等职。

由于史料散佚，建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关停等情况，现今难以翔实完整地了解。不过，黄炎培先生能够团结钱新之、浦拯东等当时政界、商界的“风云人物”，说明他卓尔不凡的个人魅力与社会影响力，被誉称为“老板中的老板”是实至名归的。

李大钊的墓碑

周二中

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当时具体工作是由中共领导的左派组织革命互济会做的。

送葬的队伍来到西单路口，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同时，一路上不断有人大声疾呼李大钊的事迹和精神，宣传他的主张。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宪兵的恐慌，他们极力阻挠，还抓了不少学生。

出殡的队伍到达万安公墓，看坟人跑过来问：“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众人一看，石碑的上方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经过商议，大家感觉这样的碑要是公开立起来，肯定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还是隐蔽一点为好。于是将碑埋在墓旁地下。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有人想到这块碑，一挖果然挖到了，随后被保存在陵园纪念馆里。此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向世人静静地诉说着那一段黑暗的历史……

陶行知与牛为友

张雨

那里的人吃苦耐劳，我们应尊重牛，而且要学习牛拉犁不松套的精神，牛是农家的命根子，牛是我们人类最亲近的朋友。美好的生活是靠我们像牛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脚踏实地辛勤劳作换来的。”

晓庄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陶行知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此联读来不仅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他一贯倡导教育改革的宗旨，旗帜鲜明的倡导深入农村接触社会。陶行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穿上布衣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生产，挑粪种地，睡地铺，住牛栏，并与牛为友。他与牛为友，可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精神。他一生为发展中国的平民教育鞠躬尽瘁，扑心扑命，用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形容他的一生，再贴切不过了。

熊式一与萧伯纳

年世墨

演了快3年了，他才向熊式一泼了一盆冷水：“这只能算是一出三文不值二文的传奇老腔旧调而已。”

与此相反，萧伯纳对熊式一创作的另一出戏《西厢记》却大加赞赏，不吝赞美之词。他在信中称《西厢记》“是一首令人心爱的舞台好诗，可与我们最佳最妙的中古经典戏剧并驾齐驱”。

在萧伯纳“不要等旧戏上演了再写新戏”的劝告下，熊式一紧接着创作了剧本《大学教授》，并在扉页献词中将此剧献给萧伯纳。1939年，该剧在摩尔温戏剧节上演，与之同台的是萧伯纳的晚年杰作《查理二世快乐的时代》。在一系列交往中，萧伯纳的特立独行与风趣幽默给熊式一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熊式一带动了老同学去拜访萧伯纳，老同学极力夸赞萧伯纳牙齿好。没想到，萧伯纳马上从嘴里掏出一排假牙，递给老同学手上，让他仔细欣赏。

萧伯纳八十大寿，熊式一将梅兰芳送他的一把古铜拆信刀作为寿礼转送给萧伯纳。一次，二人在街上偶遇，萧伯纳从口袋掏出一个先令给熊式一，并请熊夫人作证，他是花了一先令买的刀。原来，按西方风俗，凡是朋友回送刀，友情就会被割断。萧伯纳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维护着自己与熊式一的友情。

“待考”的作家关露

郭良正

通过封锁线等要事。

新中国成立后，意气风发的关露很想重走文学之路，热情地投入到《苹果园》的创作中，但她并没能如愿，接二连三的运动，揭开她不光彩“老底”。从功德林到秦城，两次坐牢，十年生死，磨平了她的意志和锐气。此后，关露参加了四次文代会，此时她已是垂垂老者，再也见不到意气风发的往昔。1982年因过量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远走的关露，被她的老同事以及挚友们时常牵挂，并给了她中肯的评价：夏衍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周扬说，她为人很善良。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这句歌词，据说是她的作品。时至今日，却仍找不到关露的鸿篇巨著，这首欢快的歌词，也足以让人时常记起这位才女作家。

黄炎培当“老板”

王荣 王抒澹

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在他的一生中，还曾经有过几次“老板”经历，被誉称为“老板中的老板”。

任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世纪初，上海与川沙两地间人员往返频繁。黄炎培关心桑梓，并判断出两地交通需求必然旺盛，决心发起修筑上川小铁路。1921年1月，黄炎培号召川沙乡绅张志鹤、顾家曾等人，发起成立“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黄炎培担任董事长，拟集资20万元修建上川铁路。

1922年2月初，上川铁路开工。由于顾伯威等人精心经营、谨慎施工，至1925年10月自上海浦

东庆宁寺至川沙龚路镇一段建成，长12公里，建桥梁17座。10月8日举行通车典礼，黄炎培与公司同仁招待各界来宾500余人。试车日，每日来回4次；当日乘客即达700人次。以后计划增加到每日8次来回。

1926年7月，铁路线通至川沙，全长21公里。1934年5月，上川公司与川沙县政府订立租用川钦县道合同，将上川铁路向东延伸至小管房，原在四灶港北的川沙站搬至川沙镇北重建。1936年3月，又从小管房向南修筑至南汇县的祝桥镇。至此，上川铁路全长达35.35公里。

上川铁路促进了浦东地方经济的发展。《川沙县志·交通卷》记载：“自上川铁路通行，遂成了强有力之交通主干，四乡公路、邻区航运，相机而兴……循是以进，若干年后，最

尔川沙，当有较速发展。”

任重庆建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42年7月，黄炎培等发起成立建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由重庆市社会局转呈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登记，资本总额为国币125万元。公司取名“建夏”，寓有建设华夏之意。黄炎培任董事长，钱新之、霍宝树、刘航琛、浦拯东等为常务董事。4位常务董事皆是当时中国工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钱新之是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职教社董事会主席、金城银行董事长。1949年去香港，后定居台湾，1958年6月卒于台北。